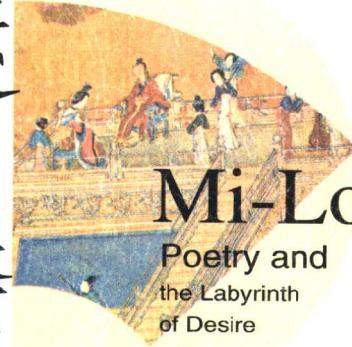


迷 楼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Stephen Owen

| 诗与欲望的迷宫

[美] 宇文所安 著
程章灿 译

诗歌可以唤起我们心中渴望迷失的那一部分。



迷楼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Stephen Owen

诗与欲望的迷宫

[美]宇文所安 著
程章灿 译
田晓菲 王宇根 校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Stephen Ow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 / (美) 宇文所安著；程章灿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2
ISBN 7-108-01959-0

I. 迷… II. ①宇… ②程… III. 诗歌 - 文学研究
- 世界 IV. 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2720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35 千字 图字 01-1999-1219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中文版序

宇文所安

我从未想到《迷楼》会被译成中文。我以为它是一部格外难译的书。当我看到译文，看到多少时间精力花在它身上，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困难的性质，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读者大概都对汉语的文化纵深和微妙的层次感到自豪：在汉语里，某一字词，某一典故，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的语言风格范围宽广，变化多端，“大白话”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极端的可能性而已。与此同时，中国读者似乎很容易就把英文视为意义透明的语言，认为这些意义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部字典中查找出来。事实上，英语也存在同样宽广的变化范围，它可以充分利用悠久的欧洲文化传统，就和某些汉语写作利用中国文化传统一模一样。一般来说，当我就中国文学进行写作时，我并不期待我的读者会理解或者欣赏那样的英语文字，因此，我很少使用欧洲文学和文化故实。不过，当我写作《迷楼》一书的时候，我所期待的读者是熟知欧洲传统的，因此我感到我可以自由地引用这一传统，尽情游戏于这一传统。在把中文翻译成英语

的时候，注解往往是必须的；有时，我简直怀疑是否《迷楼》也应该有一些中文的笺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论述或者论辩的性质。田晓菲和王宇根在校对译文时，都曾评论说很多论述在英文中非常清楚，但是一旦译成汉语，就好像作者在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其间的逻辑关联并不明显。我听了这番议论，不由得微笑起来，因为我想到在我翻译汉语作品的时候，常常不得不在脚注中作出解释，指出这些论述在汉语原文里十分通达，但如果直译为英文，就变得不知所云。当然，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它可以由中译英或者由英译中，其论述脉络仍然可以十分明晰，不至于在理解方面引起困难，但只要其中任何一种文化——中或英——诉诸自己的历史，那个“共同语言”就会立刻分崩瓦解。在英文中，《迷楼》可以游戏笔墨，可以充满跳跃性，可是这种跳跃性并不会给读者带来太大的困难；在汉语里，效果则非常不同。英语是高度隐喻性的语言，追溯一个隐喻的种种变形并不是特别的难题（比如说，女人作为石头，在欧洲诗歌里有很长的历史）。而在汉语里，也许就会显得有些奇怪。

当约翰·多恩要求他的妻子脱衣的时候，他在游戏：游戏于理念、欲望和文字。诗歌和游戏在欧洲传统里总是紧密相连。如我在书的前言里所说，诗的游戏使思考困难的问题成为可能，也使我们得以说出在“严肃”话语里无法言说的东西。“严肃”语言的种种习惯迫使我们把事物归纳进熟悉的范畴，作出司空见惯的寻常区分；诗歌则允许我们看到在“严肃”话语里被压抑的各种关系。在西方传统中，诗歌有时被视为“严肃的游戏”。

《迷楼》一书，旨在成为“严肃的游戏”。这部书来源于我对比较文学现状进行的长期思考，特别是针对在比较语境里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发现，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者

英文诗作出的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有时，它使我从全新的眼光看待这首诗。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建构比较的范畴。举例来说，华兹华斯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也是“浪漫主义诗人”。每个读过华兹华斯和拜伦的人都知道，他们被视为“浪漫主义的”这一事实，除了告诉我们这两位诗人以非常不同也非常复杂的方式和19世纪初期英国以及欧洲的思潮具有某种关联之外，对理解和诠释他们的诗歌毫无用处。当我们称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时，我们把这一范畴变成了一个普遍的范畴，从而放弃了它的特殊历史语境。这样一个宽泛的“浪漫主义诗歌”范畴也许可以指出华兹华斯、拜伦、李白的一些共同点，但是这些共同点太概括，对阅读具体诗歌没有什么帮助。这些过于宽广的范畴，其弊病不仅在于对中国诗人（如李白）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拜伦）进行比较；在这个层次上，即使我们只是比较华兹华斯和拜伦，也还是一样的有问题。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甚至忽视了具体诗歌的微妙之处，而正是这些微妙之处，使那些诗歌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关键是：有没有什么途径，使我们可以把中国诗和其他国家的诗歌放在一起阅读，对它们一视同仁地欣赏，同时也从新的角度看待每一个别的诗？

有一种思考比较文学的常见方式，那就是使用建筑的比喻：中心语词都来自欧洲传统，围绕这些中心语词，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结构，好似在一栋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的房屋里，一个人总是知道他在房屋的哪一个部位。大的体裁包括史诗、抒情诗、戏剧——小说是后加上去的。如果中国文人就诗和词作出深刻的区分，这种区分在这样一栋房子里没有地位，因为诗和词都是“抒情诗歌”。



这使我想到一座与此相反的建筑物：隋炀帝的迷楼。在迷楼中，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置身何处，他从一个房间漫游到另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给他带来不同的乐趣。这和欧洲传统里关于迷宫的神话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迷宫里，一个人总是想要走出去；在迷楼里，这个人却尽情享受留在里面的经历。

其实我本可以把上述观点换一种方式重新加以阐述，使用复杂精致的理论语言，讨论学术界存在的西方概念霸权，并把来自中国传统的迷楼，作为抵抗这一霸权的工具。但是一旦想到迷楼的隐喻，我就必须放弃那种理论性论述，因为它正好会重新生产出它所要抵抗的霸权话语。迷楼需要乐趣和惊喜。我们可以满怀乐趣地阅读中国诗和英语诗以及其他欧洲诗。来自不同传统的诗歌可以彼此交谈，只要我们不把它们分派到一个正式的宴会上，每首诗面前放一个小牌子，上标它们应该“代表”哪一传统。如果我们不去麻烦这些诗，不迫使它们代表“中国诗”、“英国诗”、“希腊诗”，它们其实有很多“共同语言”。

不用担心。明天，你就会把这部书看完。然后，一切都会复归本位。“迷”不会持久。留下的也许只是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把这些诗分开的东西，内在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内在于这些诗。

最后，我要感谢程章灿教授，承担起翻译这部书的困难任务；感谢田晓菲，也感谢王宇根，付出很多努力，解决其中的困难。我相信写这部书要比翻译这部书更有乐趣，但是我希望对于读者来说，它可以再次成为乐趣的源泉。

(田晓菲译)

喜怒哀乐，虑叹变逝，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庄子·齐物论》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礼记·礼运》



迷楼：使人迷失的宫殿

炀帝（569－618）晚年，尤深迷女色，他日顾谓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内无事，此吾得以遂其乐也。今宫殿虽壮丽显敞，苦无曲房小室，幽轩短楹。若得此，则吾期老于其间也。”

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项升，浙人也，自言能构官室。”帝翌日召见问之。项升曰：“臣乞先奏图本。”后数日进图。帝览大悦，即日诏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

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窗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人误入者，虽然日不能出。

帝幸之，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诏以五品官赐项升，仍给内库帛千匹赏之。诏选内宫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每一幸，有经月而不出者。

唐无名氏，《迷楼记》

迷楼

诗与欲望的迷宫

绪 论

I

我们可以进而让她的辩护者中那些热爱诗歌然而并不是诗人的人，允许他们用无韵的散文为她作辩护：让他们证明诗歌不仅令人愉悦，而且对城邦和人类生活有益。我们会怀着友善的心情倾听，因为如果这一点能够被证明，我们将理所当然地成为受益者——我的意思是，如果诗歌既有某种用处，又令人愉悦……

如果这些人为她所作的辩护失败，那么，我亲爱的朋友，就像其他一些人曾经对某些事物情有独钟，当他们认识到其欲望与其利益背道而驰时就反过来自我克制一样，我们也应该追步这类有情人的作风，将她弃置不顾，尽管这样做未必不要经过一场挣扎。热爱诗歌，这是高贵的城邦向我们灌输的教育，我们也曾从中深受激励，因此，我们要让她以最美好、最真实的面容出现。但是，只要她不能够很好地自我辩护，我们的这种看法对我们便总是一句咒语，当我们聆听她的音调时，就会反复念起这句咒语，这样我们就不会像被她俘获的芸芸众



生一样，堕入那种幼稚的爱恋之中。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诗歌如我们前所描述的，不能当真认为是能获得真理的，聆听诗歌的人，如果忧念其心中的城邦的安危，就应该提高警惕，抵御她的诱惑，并且把我们的话当成他的信条。

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

正是从荷马史诗中，城邦中的孩子们接受了柏拉图在这里谈到的那种教育和哺养（希腊文作 *trophe*，意为“哺养”）。然而，课程的内容是什么呢？尽管史诗道貌岸然地、老生常谈似的传授了一些实用的知识，尽管史诗以寓言式的智谋揭示了隐藏在专断、溺爱、脾气暴躁的诸神的行为之后的严肃真理，事实上，第一部史诗《伊利亚特》仍然是一部关于暴力以及暴力的狂喜的诗篇；是一部关于一座城邦的毁灭的诗篇，是一部关于个人荣誉、关于骄傲、关于欲望的诗篇，凡此种种情感，都违背了群体的利益，并将其推向毁灭或接近毁灭。它是一部关于那些即使通过最好的哺养和教育也无法控制的力量的诗篇：它把诸神毫无理智的感情冲动和一时的心血来潮描写得绚丽煊赫，而嘲弄了凡夫俗子们合情合理的决断。²

那儿有情，还有欲望，
和那迷人的亲昵话语
甚至偷走了
最贤明的人的才智。

《伊利亚特》，卷14，行216－217



对人和神的这些危险的冲动补偏救弊的是史诗《奥德赛》，这一部英雄传奇描写一个诡计多端、善于伪装的人，靠接二连三的计谋，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软弱无力的控制感情冲动的措施。

这些诗歌应该以某种方式让一个年轻人做好准备参与 polis 即城邦的生活，并且在经过适当考虑之后，为群体的共同利益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这样的群体在军事上的象征就是盾牌阵，即军士方阵，在阵列中，个人向前冲锋时的荣誉或往后撤退时的安全，必须服从于整个集体的荣誉与安全，二者都只有靠每一个体在阵列中各就各位方可以得到保证。单兵擅自行动，冲到阵列的前头或者逃到阵列的后头，就在坚不可摧的盾牌阵表面留下一道裂缝，留下一个敞开的缺口，暴露在这个小小的裂口之下，每一个人都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然而，《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基琉斯不知何故总是要么冲到阵列的前头，要么落在阵列的后头。

当柏拉图对应该如何最成功地造就年轻人为社会服务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迷人的荷马世界与城邦的价值取向之间这种奇特而不合情理的关系，并没有逃脱他的理性的关注。柏拉图并且以败坏对年轻人的教育为理由，传唤诗歌来进行一场公开的审判，正像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曾经被审判一样。拥护诗歌的人必须为诗歌提供辩护，不要滔滔不绝的雄辩，而要合情合理的辩护。

在这场审判中，公认的智者和那些为公众利益作了深思熟虑的决断的人都坐在权威的席位上，法官宣布：“在这里被审判的不是我们。”来到审判席前，就是默认接受其程序、其证据的认定标准及其论辩方式。诗歌的辩护人被迫遵照法官制订的规则进行辩护，他们只能靠最机智的花言巧语和隐瞒真相来为诗歌辩解。如果说在这场仍在持续的审判中，为诗歌的辩

护从未彻底失败过，诗歌也从未最终被逐黜出理想国，那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理智清明到不愿意相信那些既有吸引力、从情理上说也似乎不无道理的谎言——这既包括诗歌本身所撒的谎言，也包括我们这些拥护诗歌的人所撒的谎。我们有成堆的作证誓言，成堆的被收买的说好话的证人，企图证明诗歌是高雅可敬的。正是由于诗歌甘愿委曲求全戴上一副谨小慎微的道德面具，才使它得以在社会教育中保留了次要的一席之地。

但是诗歌确实会引导公民误入歧途。它可以说一些甜蜜的、诱人的话语，打动我们，让我们潜移默化。在正规情况下，我们称诸如此类的事件为迷失，我们能够隐约认识到这种迷失中包含着从令人厌倦、老生常谈式的社会价值观中越轨而出的快感，而当有人问起我们，我们总是大声重申我们对那些价值观是信守不移的。不要误解：我们肯定那些价值观，是因为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每当有二三人相聚相处的时候，这些价值观似乎就会不期而至地表现出来。它们恰恰就是我们一致赞成、并且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赖以生存的那些至理名言。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欲望的自由，我们什么都不愿意放弃，什么都想要获取。我们厌烦美德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我们如饥似渴。伟大的诗歌中可能有某些东西，与我们自认为应当恪守的那些价值观相背离，尽管这些东西外表伪装得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最为危险的；这些诗歌中可能有某些东西破坏人类的共同利益，却对人心中的野兽礼敬有加。

虽然诗歌会暗中破坏社会的根基，侵蚀其高尚正义的价值观，但是诗歌没有提供另一种乌托邦秩序的前景：这场革命从来不允许获得成功——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就要被迫放弃我们的欲望自由。诗歌设想不出哪怕一个理想国，它无法从许许多多可能的、彼此冲突的利益中选定一个。



而且，在日常情况下，外在于诗歌的那个现实世界将羞耻感和屈从心之类的清规戒律强加在人心中的野兽身上，诗歌顶着这些清规戒律逆流而上，并从中汲取力量。社会用言词束缚我们，而诗歌也用言词迎头反击：用无懈可击的言词，模棱两可的言词，轻重权衡的言词，与通常被社会驱使得单调乏味的言词相对抗的言词。诗歌用这些言词对我们诉说，并且不动声色地试图侵蚀所有不小心听它诉说的人。危险的状态会被我们看成理所当然，而不理智的激情一时间可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激动。这些言词能在某些形象周围洒下一缕欲望之光，而让其他形象去面对愤怒与厌恶。尤其重要的是，诗歌可以用反抗的自由来诱惑我们，从而使所有彼此矛盾的、未曾实现的可能性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烈的对抗运动。

我们在诗歌中所经历的精神实验，对社会并不造成立竿见影的或实实在在的危害，但是，它们可以使人类心灵潜移默化；它们以饲料喂养那只野兽，使之不致死于社会习俗之手。我们生活在清规戒律当中，无情的自然与人类社会将这些限制强加于我们，而这个人类社会总是千方百计地渴望与自然的必然性分庭抗礼。但是，我们每一个心中都有一只野兽，它不喜欢身上的枷锁。诗歌用言词饲养这只野兽，唆使它恢复反抗和欲望的本性。⁴

自然对我们心中被唤醒的反抗意识漠不关心，这显得有些莫名其妙；虽然我们对它的法则这么深恶痛绝，发现这些法则很不公正，它也并不因此而惩治我们。但是，社会却为此心怀不安，忧心忡忡。对这些忧惧，诗歌会立即作出回应：对公众信仰的神祇大唱赞美诗，对帝王歌功颂德，写一些诗体的箴言，加上其他一些无聊乏味的真理以及精心构撰的谎言，以此来抚慰坐在审判席上的社会。



柏拉图已经清楚地看到，为诗歌辩护势必引出关于教育的问题，而教育意味着我们的可塑性。诗人与诗歌的拥护者曾声称诗歌能培育出更好的公民，诗歌能传播“文化”，并将他们的辩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这个一开始只是为了应急而编造的谎言（这样随随便便就被拖到法官席前，除了将全部指控抵赖得一干二净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作为呢？）实在显得太过厚颜无耻，不能一劳永逸地用下去。这第一个弥天大谎破产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更有冒险性的辩护：我们继而声称诗歌是绝对安全的，无关紧要的，声称艺术与所有事物的实际后果之间是有距离的，声称那只野兽听了诗歌的花言巧语也不会醒来。“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假设我们当中至少有三个人在场），“任何对于美的判断力，只要搀杂了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点个人利益，都将变成非常不公正、不纯粹的趣味判断。”他由此向社会证明，不管我们在艺术的核心发现的是哪一种美丽，它都不能触动我们的动物性欲望。

有关诗歌的公共话语传统再三保证诗歌的读者有一块既安全又保险的立足之地。艺术作品是一件东西，审美距离将我们与之隔开，这种观念既是失之片面的真理，又是权宜应付的欺骗，是当着仍在开庭的柏拉图的陪审团的面临时拼凑出来的。任何一个有过艺术体验的人，从通俗音乐引起的大众迷狂到古老诗篇带来的更加深费思量和更为博学多闻的快感，都知道艺术鉴赏和阐释中刻意保持的距离，并不是我们与一篇诗作或一首歌曲发生联系的首要条件。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向社会报告情况时，我们却常常重申这样的距离，向法官保证我们已经处于艺术危险的包围圈之外。
5 我们说我们并未改变，说我们每一个善良正直的公民并没有因诗歌而蒙羞受耻，说我们并没有发现诗歌中的声音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声音。

私下里，我们可能就不那么自信了。有时候，那些诗句不停地向我们反逼过来，默默地嘲笑那种兢兢业业地履行社会职责的平庸乏味的生活，抑或在平凡的邂逅中激发欲望，这欲望是如此伸手可触，让人如饥似渴。当我们站在盾牌阵中，这些言词在我们耳边喃喃低语，怂恿我们大胆地向前猛冲，或者扔掉盾牌，逃之夭夭。在另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词，只是隐隐约约意识到，置身于艺术世界的另一些地方，不知为什么我们就不再是从前的我们。诗歌可以唤起我们心中渴望迷失的那一部分。作为一次真正的迷失，当它不仅仅是某些可以预见的对日常规范的越轨，或者仅仅使某些已经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阴暗面变本加厉时，它是最强有力的。当我们屈服于这种迷失，就会遭遇一个不期而至的他者，而它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也许社会的忧惧是有道理的：我们发现公民的“自我”可能是柔顺的，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其稳定性则可能是靠不住的；自我也可能只是由常规言词和公共言词守护的一方净土。靠这些言词，我们才能与他人和睦相处；靠这些言词，我们相互间的言行举止才变得可以预期；我们服从社会，隐匿真心，克制自我，将种族的风俗习惯视为理所当然。而其他那些言词，那些诗歌的言词，则打乱重排了人际关系，瓦解了风俗习惯，并且对什么都放言无忌。

反方的声音

不要担忧，——其实这并不是真的——诗歌就是我们对它的阐释，如此而已，而那些阐释是读者隔着一段不可摧毁的距离来考察诗歌时作出